

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的影响

胡 玲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16—18世纪,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在欧洲广泛开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这不仅对耶稣会本身产生复杂的影响,而且通过培养教士、政府官员和普通信徒,有力地促进了天主教的复兴;在古典文化、宗教教育、自然科学和戏剧方面对欧洲文化也产生广泛影响。

关键词:耶稣会;天主教;新教;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K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9)06-0771-05

1534年8月,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创立耶稣会,1540年9月,教皇保罗三世(1539—1549年在位)宣布它为正规修会。作为天主教自我革新并抵抗新教改革的有力工具,耶稣会在德国、意大利等国非常活跃,采取各种措施维护传统天主教、阻止新教的传播,其中不乏极端手段。所以,以前很多学者认为耶稣会是“反动的别动队”。就天主教与新教的发展趋势而言,可以说它总体上具有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性,但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在教育方面。1548年,耶稣会在西西里创建墨西拿学院,“它是第一所为大众提供教育的耶稣会学校,是所有其他耶稣会学院的原型。它的建立标志着伟大的耶稣会教育事业的开端”^{[1]94}。此后,耶稣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到1773年,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解散耶稣会时,它拥有会士23 000人,学校约800所^{[2]256}。马尔奇·马丁说:“在他们功绩的顶峰,即建立后200年,耶稣会在欧洲和拉美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教育和科学中都有构成和决定性之权。”^{[3]30}据估计其在校学生人数约20万^{[4]221},它不仅是“现代世界第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5]12},而且开辟了天主教世界正规教育的新纪元。笔者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从以下几方面对耶稣会教育进行简单的评述。

(一)对耶稣会本身的影响。

教育作为耶稣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它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于耶稣会教育的优越性,吸引了大批学员。相比于传统的天主教教育,耶稣会教育的改进之处在于:其一,课程设置范围更广。在传统七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逻辑)之外增加心理学、伦理学、代数、物理、化学等。其二,传统教育反对学习古典著作,如法兰克宫廷学院创立者阿尔琴(约735—804年)早在七百多年前就说过:“圣经中的诗人已足够你研究了,何以要用维吉尔的典丽诗句去玷污你的心灵呢?”^{[6]201}耶稣会学校却比较重视古典文学,选用古希腊、罗马著作作为教材。三是采用了班级授课制。四是比较重视科学教育。因此,从1548年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后,他们招收的新成员50%来自学生^{[7]54}。

第二,1621—1676年间,除几个例外,教皇都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其中大部分在罗马学院学习。这些教皇和耶稣会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优秀的耶稣会士进入罗马教廷担任高职。这样,耶稣会取得了教廷的信任,不断得到支持和拥护。如17世纪20年代,罗耀拉、博加、沙勿略被宣布为圣徒;在罗马,耶稣会已拥有四所教堂,教廷又准许他们增加一所;1640年,教皇乌尔班八世(1623—1644

收稿日期:2009-09-09

作者简介:胡玲(1977-),女,江苏丰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研究。

年在位)坚持为耶稣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付款并组织奢华的庆祝会^{[2]223}。总之,与教廷关系的融洽保证了耶稣会的顺利发展,使其事业在17、18世纪达到了高峰。

第三,冲击了耶稣会的“绝财”誓愿。耶稣会从创始起,所有会士必须谨守“绝财”、“绝色”、“绝意”三愿。但是,开办教育事业使他们必然接受施舍、捐赠。到16世纪后期,他们开始利用捐赠的土地增加收入,特别是在西班牙及其属国,许多耶稣会大学出租它们的领地。1725年,埃武拉大学的13个庄园出租了7个;1750年,圣·弗朗西斯科·泽维尔的里斯本学院的13块地产全部出租。耶稣会不仅收取货币地租,还接受实物地租。如亚速尔群岛的蓬塔德尔加达学院拥有51家佃户,这些佃户缴纳货币230 740卢比,谷物193 493公斤。一些大学还拥有许多牧场,会士们即牧场主。如从1641年到1701年,牧业是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主要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3.9%—41.5%;1708年的埃武拉大学,拥有2 535只绵羊、544只山羊、530头猪、230头奶牛、152头公牛;1760年的马拉尼昂学院有15 600头牛、500匹马,还有其他牲畜;18世纪50年代中期,贝伦神学院的两个甘蔗种植园有300头牛、120匹马;这时期的巴拉那的耶稣会学校有2 030头牛、1 021匹马。^{[8]403-404}所以,这些会士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称作“马背上的教士”。耶稣会积极参与经济生活,虽然为困境中的大学开辟了一条广阔道路,却使会士遭到批评、谴责,产生了一系列长眠于罗马的罗耀拉未曾预见过的问题。

第四,教育彻底改变了耶稣会巡游服务(i-tinerant ministry)的观念。耶稣会的《章程》规定:“我们机构的第一特征”是会员自由巡游世界各地,这一特征最重要的典范是《新约》中所描述的巡游传教士^{[7]239}。建立学校后,会士成为定居的教师无疑有损于他们这一形象。

第五,教育使耶稣会参与到世俗生活中。为了教学,会士们广泛涉猎各学科领域,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仅提高了会士本身的素质,也增强了耶稣会学校的吸引力,这是任何其他教团无法企及的。另外,学校里经常上演戏剧,改变了他们原来对音乐、舞蹈的态度;校舍的建筑也使他们与建筑师的联系越来越多。因而,耶稣会比以往的任何教团更广泛地融入世俗生活。

第六,对1773年耶稣会解散前后的影响。18世纪,耶稣会逐渐脱离时代精神,不能妥善对待启蒙时代的经验论和理性主义,一步一步地失去了它在教育上的美好声誉,导致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17、18世纪耶稣会教育的突出成就,在提高修会声誉的同时,也成为敌手们嫉妒的焦点,使它树敌颇多。如16世纪末,其他修会利用耶稣会克莱门特学院学生企图刺杀亨利四世的机会,迫使其关闭许多机构,直到1603年,耶稣会在法国的教育事业才得以恢复^{[9]173}。竞争对手、敌手的攻击加速了耶稣会的解散。但是,耶稣会在被教皇解散之后,17、18世纪的教育业绩使它能和一些国家继续存留。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没有颁布教皇的解散敕令,在这两个国家,耶稣会只是受到一些限制^{[10]387}。在法国,为了拥有高素质的教师,也允许耶稣会士留在学院中。总之,教育使耶稣会在被解散之后仍有立足之地,为后来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在天主教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诞生于天主教会举步维艰之时的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本着“愈显主荣”的根本宗旨,建立伊始就参与了天主教革新运动,成为天主教复兴的中坚力量。耶稣会之所以能与代表历史潮流的新教抗衡,并在天主教改革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开办教育无疑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历史表明,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在欧洲的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这里以德国为例:

罗耀拉对异端诞生地——德国非常重视,耶稣会成立之初立即把法伯尔、杰伊派到那里,他们吸收的第一位德国籍会士是彼得·迦尼修。由于迦尼修坚定的信心,法伯尔曾写信给罗耀拉说:“他正是我要寻找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上帝天使的话。”^{[11]557}罗耀拉也很快认识到他的价值。之前,德国的局势曾使法伯尔感到无助,他在信中对罗耀拉说,德国的情况,“不是对圣经的误解,不是华而不实的论战,不是布道和劝诱的路德派,罗马教会已夺回了他们的很多省区和城镇;而是教士们臭名昭著的生活”^{[11]558}。1552年迦尼修到达维也纳时,也惊讶地发现邻省区254个教区没有一个教士。德国天主教教士的状况与路德派教士

形成显明的对比,后者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忠于职守。耶稣会士和新教徒都说在乡村教区很难发现一个能正确主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教士,更不用说他们能够过一种激励信徒们的生活了。所以,许多天主教徒很容易受巡游的高素质新教传道士影响是不足为奇的^{[12]88}。针对这一局势,1554年8月,罗耀拉在信中指示迦尼修,“帮助天主教的另一卓越方法是增加耶稣会的学院和学校”^{[13]146},对小孩和青年人施以拉丁语和天主教教义教育,并教育未来的教士。1555年,迦尼修在因戈尔施塔特建立了一所学院,它在德国成为“天主教复兴的最有创造力的中心”^{[14]436}。随后,他又在科隆、布拉格、因斯布鲁克建立学院,以培养高质量的新教士。同时,也为男孩子们建立一系列学院,从而提高天主教在显贵家族中的影响力。经过31年的不懈追求,到1580年离开德国时,迦尼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有18所学院处于他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之下,有1100多名会士服务于这个帝国。在他们的努力下,天主教逐渐走出低谷并迈向复兴。所以,“在德国,彼得·迦尼修的名字常被作为耶稣会的同义词来接受”^{[12]85}。

德国之外,迦尼修的许多同事们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遍及欧洲的耶稣会学校以其成功的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首先,它培养了新一代的教士,这些教士成为天主教复兴的重要力量。如创办于1551年的罗马学院,建立之初即享有盛名。1581年蒙田参观了罗马,他在《游记》中写道:“在基督教世界中,这所大学是一个奇迹……它是伟大人物的摇篮。”^{[15]137}在建立后的5个世纪中,罗马学院为天主教会培养了6位圣徒、30位接受宣福礼者,12位教皇和几百位主教、红衣主教,被称为“教皇的学校”^{[16]116}。日耳曼学院于1552年创办于罗马,它的很多毕业生后来成为主教或帝国教会的领袖人物。到16世纪末,日耳曼学院学生已掌握了萨尔茨堡、布雷斯拉夫、奥尔米茨、奥格斯堡、的里雅斯特、维尔茨堡、帕绍等地区的主教职位,被称为“主教的工厂”^{[16]118}。这一称号一直维持了200余年,1560—1803年,德国约有18%的主教毕业于该学院,奥地利更有30%的主教职位被该学院毕业生控制。学校对普通教士素质的提高更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其次,培养政府官员,影响世俗政权,为天

主教复兴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许多国王、诸侯、官员是耶稣会学校的毕业生,如德皇斐迪南二世、巴伐利亚公爵马克希米连二世、法国首相黎塞留和马萨林等。这些毕业生在掌握了世俗政权以后,大都执行了有利于天主教的政策,维护了天主教的地位。有的甚至通过行政、军事手段,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利益,为天主教复兴提供了政治保障。再次,吸引青年和异教徒,扼制新教扩张,推动天主教复兴。耶稣会学校是免费的,使下层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如1561年纳德尔说蒙雷阿尔(Monreal)学院400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下层穷苦人;教育方法与政策非常灵活,因而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如在宗教教育上,虽然身为天主教的坚定维护者,罗耀拉不主张强迫任何人参加宗教活动,认为对非自愿者“应柔和地劝说,不要强迫,不要因为不遵守而驱逐出校”^{[5]12}。他们允许路德派学生免背圣徒连祷文,胡斯派学生可以不接受圣餐等^{[7]207}。这样,耶稣会吸引了大量俗人甚至异教徒,不仅坚定了天主教徒的信仰,也使一些新教徒改宗天主教,进而影响了学生的父母。

所以,耶稣会的教育为维护天主教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R·波一恰·塞厄所说,天主教受到新教的严重打击,“拖着被新教异端致伤的四肢,只有心脏还在死亡和复兴之间跳动。对近代早期的天主教来说,这颗心脏只有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跳动强烈,输送新鲜血液使其病体恢复活力”^{[17]42}。在那里,输送新鲜血液的就有耶稣会一份功劳,其重要方式之一是教育。美国圣经学者G·F·穆尔也曾写道:“在这次天主教的复兴运动中,在促使一切脱离罗马的地区和国家重新皈依正统教会方面,没有一个机构发挥的作用比耶稣会更大。”^{[18]273}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统计教育在其中的分量——即教育所影响的人数和影响的程度,但可以确定它的意义是广泛和重大的。

(三)对欧洲文化的广泛影响。

作为一支活跃的文化力量,耶稣会不仅使欧洲受教育的人数增多,其整体素质相对有所提高,而且影响了欧洲过渡时期文化的发展。表现如下:

首先,耶稣会受人文主义者影响,重视古典文化教育,“他们在防止古典著作完全消失上做的比其他团体多得多”^{[19]183}。在耶稣会的初等教育阶段,一般开设3年文法课,1年古典文

学,2—3年修辞学。拉丁语作为中世纪以来至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也是耶稣会的官方语言,他们通过教义问答简写本、西塞罗的书信选学习这种古老的语言。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也是必须学习的,因为“这两种语言对于进一步研读圣经和拟定许多天主教意见尤其有用”^{[20]43}。对于古典文学,罗耀拉的秘书博兰克曾说,它的学习为年轻耶稣会士的神学学习做了准备,并促使他们“为上帝作更大的贡献和帮助我们邻居”^{[5]4}。为此,高年级的学生们要熟悉众多的拉丁作者,如西塞罗、恺撒、昆体良、李维等。学校特别重视西塞罗的演说词、《论演讲》,奥维德的《变形记》、《哀歌》,泰伦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这些著名散文作家的作品,也是必备的读物^{[14]575}。继承人文主义传统的耶稣会也非常重视修辞学。耶稣会修辞学教师佩德罗·胡安·珀皮那认为,基督教世界正在争战,修辞将决定谁负谁胜。罗马学院的毕业生庞培奥·乌戈尼奥说拉丁修辞的用武之地已从世俗政府转移到教会,从讲坛转移到梵蒂冈,“请……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独一的梵蒂冈山和最神圣君王的威严宝座上一会。在那宗教的城堡里,修辞的用途有多少种、又多么不同”^{[20]13}。每年的节日,赞美上帝要大量运用修辞。制定法律、颁布敕令、书信写作、教皇的葬礼演说、新教皇的选举、主教讲道、教导无知者、召集宗教会议,也都需要运用修辞术。“没有人能保证如此多、如此重大的事情没有修辞的大力支持能够维持下去。”^{[20]13}所以,耶稣会一反传统天主教反对学习古典著作的成规,学习古典语言、修辞,选用古希腊、罗马著作作为教材,成为古典文化的栖身之所。

其次,对于宗教的关注,使学者们的精力大量集中在哲学和神学上,促进了两者的发展。耶稣会的高等教育即神学教育,首先开设3年的哲学课程,所学范围很广,并非我们现代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它包括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神学,还有自然科学如代数、几何学、三角学、力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生理学等^{[4]215}。会士完成哲学课程将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在初等学校中执教五六年,便可继续学习神学。耶稣会的大学开设神学课程6年。前四年致力于研究圣经、希伯来语和其他开启圣经奥秘的东方文字,还有教会史、教会法规、选修课和神学仪式,然后是两年的进一步研

究、重温往日所学哲学、神学功课,并准备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如论文答辩和公开测试成功,即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经过近10年的学习,会士们在哲学、神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苏亚雷斯,他复活了经院哲学家的思辨哲学,著有《形而上学论文集》,还在巴黎进行逻辑学的教学改革^{[14]584};神学家路易斯·德·英利纳对于教会政体的争论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再次,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当时的天主教会仍试图控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耶稣会出于教学的需要必然要涉足这一领域,所以,耶稣会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并不明朗。例如在17世纪中期之前,会士们不注重地理,他们学校的地理学只是古代猜测和一些传闻的杂烩。许多海外传道者对地理非常无知。他们几乎不曾看到过地图和地球仪,对陆地的大小和相对位置认识模糊不清,几乎没有距离感,待发的船只为乘季风要等上几个月^{[2]153}。这一切给传道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到17世纪晚期,许多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开始热心于实用科学和技术,建立在准确测量基础上的地理学也流行起来。耶稣会学校的教授们收集传教团留下的材料,编纂了一系列传道史,并附以地图和绘图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理学的进步。再加上教学的压力,促使了耶稣会的学者们在许多科学领域成就突出。如会士吉罗拉莫·萨西里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他是非欧几何学几何学的先驱。其实,耶稣会像多明我会一样,都规定“让学生和其他成员只读神学书籍”^{[7]241}。但迫于教师这一职业的要求,他们不得不涉足天文、地理、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使“他们成为第一个在世俗科学领域突出的天主教学者团体”^{[3]29}。

最后,戏剧领域的贡献。在耶稣会学校的庆典上,经常有讲演、诗歌,甚至哲学和神学辩论,有些学校还出现了对话、对唱等精彩的形式。1556年圣诞节前后,波伦亚的学生进行了露天演出,表演基督降生;在复活节,他们表演了从十字架上放下耶稣。这就向成熟的戏剧迈进了一步。耶稣会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剧本是1555年由会士乔斯·德·阿科斯塔写成的。1556年,喜剧《良好的道德》在锡腊库扎学校上演,市民们曾要求公开演出,但遭到校长的拒绝,因为在学校里演出戏剧是“为了激励学生

对文学的热爱,而不是为了公开展示”^{[7]224}。但到1561年,在慕尼黑该戏剧先为一般民众后又为公爵和他的官员演出。两年后,在因斯布鲁克又公开演出两次。耶稣会的第一所剧院于1640年在魁北克建立,到1773年止,他们在欧洲共建了350所剧院。耶稣会虽然不是“学校戏剧”的开创者,但他们对于戏剧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其舞台表演艺术为现代芭蕾舞奠定了第一块基石^{[3]29}。

对于耶稣会的教育,历史上的名人各有评判。培根曾对它推崇备至,说在人文知识及道德教育方面,“他们是如此美好,我真希望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21]218}。笛卡尔从1604—1612年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读书,打下深厚的数学功底,因而罗素说:“他们所施的教育在不夹缠着神学的时候,总是无可他求的良好教育……他们传授给笛卡尔的大量数学知识是他在别处学不到的。”^{[22]43}伏尔泰则说,他在这类学校中只学到了两样东西——拉丁文和胡说。莱布尼兹说,耶稣会学校的教学水平在中等以下^{[6]346}。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很难有整齐划一的认识。出发点、视角、立场等等的不同,都会带来不同的观点。但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耶稣会的教育工作确实非常突出,会士们成为“欧洲天主教国家中的教育改革家”^{[18]274},他们所建的众多学校广泛影响了欧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迄今为止,耶稣会仍是天主教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际性修会组织,拥有并控制着为数众多的学校、电台、报刊等。

参考文献:

- [1] John C. Olin. *Erasmus, Utopia, and the Jesuits, Essays on the Outreach of Humanism*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J. C. H. Aveling. *The Jesuits* [M]. New York: Blond & Briggs, 1981.
- [3] Malchi Martin. *The Jesuits: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Betrayal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 [M]. New York: Touchstone, 1988.
- [4] Frank Pierrepont Graves. *A History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Times* [M].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4.

- [5] William J. O'Brien. *Splendor and Wonder. Jesuit Character, Georgetown Spirit, and Liberal Education* [M].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6] 戴本博. *外国教育史:上册*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 [7] John W.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Danril Alden. *The Making of an Enterprise: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Portugal its Empire, and Beyond, 1540-1750*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 A. G. Dicken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M].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9.
- [10] Owen Chadwick. *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1.
- [11] 托马斯·M. 林德赛. *宗教改革史:上册* [M]. 孔祥民, 等.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 [12] Keith Randell. *The Catholic and Counter Reformation* [M]. London, 1990.
- [13] Martin D. 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4] R. B. 沃纳姆.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5] Robert Birdey. *The Refresh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M]. New York: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9.
- [16] Manfred Barthel.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
- [17]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8] G. F. 穆尔. *基督教简史* [M]. 郭舜平, 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19] Theodore Maynard. *St. Ignatius and the Jesuits* [M]. New York: P. J. Kenedy, 1956.
- [20] Frederick J. M. Guinness. *Right Thinking and Sacred Orator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1] 威廉·博伊德. *西方教育史* [M]. 任宝祥, 等, 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22]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册* [M]. 何兆武,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责任编辑:仇海燕

作者: [胡玲, HU Ling](#)
作者单位: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刊名: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9, 31(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2条)

1. [John C Olin](#) [Erasmus,Utopia, and the Jesuits,Essays on the Outreach of Humanism](#) 1994
2. [J C H Aveling](#) [The Jesuits](#) 1981
3. [Malchi Martin](#) [The Jesuits: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Betrayal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 1988
4. [Frank Pierrepont Graves](#) [A History of Education.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Times](#) 1914
5. [William J O'Brien](#) [Splendor and Wonder.Jesuit Character,Georgetown Spirit,and Liberal Education](#) 1988
6. [戴本博](#) [外国教育史](#) 1989
7. [John W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1994
8. [Danril Alden](#) [The Making of an Enterprise:The Society of Jesusin Portugal its Empire,and Beyond, 1540-1750](#) 1996
9. [A G Dicken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1969
10. [Owen Chadwick](#) [The Popesand European Revolution](#) 1981
11. [托马斯·M 林德赛. 孔祥民](#) [宗教改革史](#) 1992
12. [Keith Randell](#) [The Catholic and Counter Reformation](#) 1990
13. [Martin D 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95
14. [R B 沃纳姆](#)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1999
15. [Robert Birdey](#) [The Refreshing of Catholicism,1450-1700: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1999
16. [Manfred Barthel](#) [The Jesuits:History and Legend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984
17.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1540-1770](#) 1998
18. [G F 穆尔. 郭舜平](#) [基督教简史](#) 1996
19. [Theodore Maynard.](#) [St. Ignatius and the Jesuits](#) 1956
20. [Frederich J.M Guinness](#) [Right Thinking and Sacred Orator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e](#) 1995
21. [威廉·博伊德. 任宝祥](#) [西方教育史](#) 1985
22. [罗素. 何兆武](#) [西方哲学史](#) 1963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胡玲. 何日取 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世界宗教研究2008, "" \(1\)](#)
16-17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天主教革新运动,而且直接吸引了大量新教徒重返天主教,增强了天主教的社会基础.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传播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2. 期刊论文 [梁丽萍 天主教耶稣会与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扎根 -宗教学研究2004, "" \(1\)](#)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基督教向中国的突进大致有四次,形成了三次峰谷,而从基督教的第三次来华才与中国文化开始了碰撞与交流.而思想的契合、学术的切入和伦理的示范是耶稣会将基督教信仰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有效途径.耶稣会来华传教的成功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只要沟通和传播手段恰

当,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与融合。

3. 学位论文 赵昕 文化传教的传承——从徐汇中学看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地区的文化事业 2007

耶稣会,是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修会,在中国,它富有开拓性地文化传教,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作为近代耶稣会传教的中心,徐家汇至今仍然保留了一大批一百多年前耶稣会士创办文化事业的痕迹。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徐汇中学创办于1849年,被誉为我国西洋办学第一校。它是我国境内第一所按西洋办学模式创办的学校,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首开我国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的先河,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849年法籍耶稣会士在上海徐家汇收容中国难民儿童及教友子弟开始启蒙授课,1850年正式取名圣依纳爵公学,亦称徐汇公学,1931年更名为徐汇中学,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一度任为校长。1953年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定名为上海市徐汇中学。作为耶稣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徐汇中学在耶稣会的文化传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徐汇中学历史发展变迁的考察,初步探讨近代中国教会中学教育建立的历史背景,展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教育制度遭遇到的困境与教会中学教育得以建立发展的原因,初步揭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主持的徐家汇教育文化事业之特点,以及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之关系,对中国近代社会之贡献,以及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之角色。

4. 期刊论文 胡玲 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事业繁荣的诸因素 -理论界2010,“(6)

在宗教改革和近代社会转型的种种困境中,作为天主教修会的耶稣会,其教育事业在16-18世纪非常繁荣,其原因主要有: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激励学生的辅助教学手段、对待不同宗教信仰学生的灵活政策、品学兼优的师资队伍、对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自我革新、对抗新教时代需求的迎合。

5. 期刊论文 吴瑛 文化传播:从天主教耶稣会到孔子学院 -现代传播2009,“(3)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视角,以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从传播环境、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和反馈等层面分析耶稣会传教士的文化传播活动。同时,将当前我国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活动与耶稣会的活动相比照,探索两者在传播规律上的共性与个性,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出建议。

6. 期刊论文 王巨新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理论学刊2009,“(8)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可以分为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三个发展阶段。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天主教在山东平稳发展,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经历两次波折,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山东被迫转入秘密传播状态。除耶稣会外,方济会在山东的传播占据重要地位,山东不仅是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地,而且是中国北方方济会传教中心。

7. 期刊论文 周萍萍.Zhou Pingping 明清间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20(1)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基于中国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其宣传众生、天堂地狱等等教义,以及其特定的一些教仪,对下层社会的平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天主教因此在平民阶层中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8. 期刊论文 王公伟.WANG Gong-wei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4)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林宏为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

9. 学位论文 曾新 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 2007

明朝末年,天主教新兴的修会耶稣会趁航海大发现之便,乘重振天主教之雄心,一帆风顺,来到澳门,开始向西方传说中神秘而富庶的中国传播“上帝”的威名。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间,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广交朋友,积极传教,一度赢得了一批支持者和追随者,但是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却被清政府禁止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天主教原有的“上帝”形象,以及相应的宗教教义,与当时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皈依了天主教的教徒理解的“上帝”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神人关系的理解方面,二者之间尤其具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本文将运用传播学、符号学以及新批评之细读细析法,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的“上帝”作一跨学科的中西宗教文化关系研究,并主要通过天主教人华原始文献中的“上帝”译名及其三个关系范畴,即上帝与世界、上帝与神佛、上帝与人的关系,由源及流、由名到实,来探讨“上帝”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一形象如何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传教过程中,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分歧,并进而揭示异同,探讨规律,彰显天主教唯一神和中国式上帝的不同特质,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深入认识,从思想文化溯源方面,挖掘中国历史上没有、今后也决不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而言,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上帝”形象的分析,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的逻辑起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无疑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因此其所传播之“上帝”之原来面貌为何,这是本文展开探讨所首先需要理清的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圣经》中的“上帝”以及天主教特色的“上帝”两个方面展开。

中国人接受“上帝”的逻辑起点:既然耶稣会士所传播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明朝之前的中国“上帝”的形象乃是我们所需清理出来的另一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中国古代信仰中的几个核心范畴“帝”、“天”、“道”以及“神”四个方面来进行。

源已廓清,第三章则是探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上帝”。此处的探讨将时时注意这一“上帝”与天主教正统的“上帝”之间的纵向对比,并兼顾其与中国传统中“上帝”的横向比较,以求凸显这一从西洋入华的“上帝”的特质。

第四章则将顺承前文思路,剖析中国受众对耶稣会士传播的“上帝”的接受情况。本章主要将受众分为皈依者与反对者来考量,但在皈依者部分也将兼及一些虽未皈依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上帝”表示出认可的友教人士的正面观点。而反对者中则将对所有反对西方“上帝”的呼声都加以考察。

最终,文章抽丝剥茧般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对人神关系的理解方面,与天主教思想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尽管当时有部分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形式上接受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但两种思想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传教活动最终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总之,中西神人关系的冲突乃是中国人村度西方“上帝”时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不能承受之“轻”。

10. 期刊论文 关汉华 16世纪后期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1)

本文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切入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作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对当时教会内部有关在华传教方针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传教方针调整后所体现的特色也作了相应论证。文章强调,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uaiysfxyxb-zxsf20090601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aa04a4da-54cf-4aa9-9177-9e4d0081eb3d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